

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大聚焦

当代中国 纪实文学百部

寰球漂泊卷

华夏出版社

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百部

(寰球漂泊卷：在地球的那一边)

周明 傅溪鹏 主编

华夏出版社

时代风云的画卷

周而复

我们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急剧变化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高速公路”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知识经济”、“数字地球”，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层出不穷。

面对迅猛发展变革的现实，在作家面前展现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也为作家展开无限广阔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新天地。优秀的文学艺术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和人民需要优秀的文学艺术。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比较易于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时代风云。

为了展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为历史留下辉煌的足迹，长期从事报告文学事业的周明和傅溪鹏两位同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花费了许多精力，组织和编辑了这一部大型丛书，皇皇十大卷，四百余万言，蔚为大观，实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事业的重要收获，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部丛书洋溢着时代感，选择了许多重要题材，反映时代风云，歌颂风云人物。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提出宏伟目标，重点也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科教兴国关键是人才，也就是重视和培养知识分子。“短绠不可以汲

深，器小不可盛大，非其任也。”（《淮南子》）没有大量的适合的人才，科学技术现代化及其他三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也就不能“兴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人类的财富！

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长江上游等地，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加，大量损失耕地，我国森林覆盖率已降到 13% 以下。今年长江流量低于 1954 年，而受灾面积和损失却超过 1954 年水灾，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人口问题是重要题材。50 年代末期 6 亿人口，不过 40 年光景，中国人口增加一倍，现在已有 12 亿多。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敲响了警钟，我国人口承载量的生命线是 16 亿左右，绝对不能超过 17 亿。

威胁中国和世界的杀手，第一是心脏病，其次是癌症；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都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全国死于癌症的人数仅次于心脏病。

上述重大问题和题材在这套丛书里，都有许多精彩反映和描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创新。这批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以热情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歌颂历史变革，反映时代风云。

丛书中所选作家的代表作，既写了事业和人物的成功与欢乐，也写了他们同各种阻力、困难和邪恶的斗争，反映人民喜中之忧和忧中之喜，从今天的现实看到明天的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目 录

在地球的那一边.....	张 墀(1)
扬眉剑出鞘	理 由(68)
中国姑娘	鲁 光(80)
中国教授闯纽约.....	何启治(134)
新的高度,属于中国	赵丽宏(204)
万隆! 万隆! 雅加达.....	尹家民(223)
攻击,攻击,再攻击.....	刘亚洲(291)
我在美国当律师.....	李忠效(344)
你带走一片阴云.....	谢望新(401)
后 记	(411)



张 铁 1933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县，1948年参加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喂过猪，种过菜，扛过粮包，拉过粪车，当过兽医……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写过诗、戏剧和电影，也写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作品多次获全国性大奖。

在地球的那一边

前 言

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中国，东半球；美国，西半球。在我们中间，隔着万里重洋，波涛浩森。

我们离开得那么遥远，曾经有过多么多的隔阂和误解。我们又是那么贴近，两块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人民的交往从未中断。美国究竟是什么模样？那里的人民究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尽管已经有了不少报导，但这些仍然是我国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

1991年秋冬之间，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到美国去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F·斯诺女士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半个多世纪之前，埃德加·斯诺和海伦·F·斯诺在中国人民特别艰难的时候，为了理解和友谊来到中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几乎成为我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喻户晓的人物。半个世纪之后，埃德加·斯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们又在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为了理解和友谊去到美国，代表中国作家把海伦·F·斯诺应得的荣誉授给她。这无

论是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或者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极有意义的。因此,在去美国之前,我就做了准备,一定要把所见、所闻、所感,都尽可能翔实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以便在回国之后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路上,我抓紧所有机会这样做了。即使在高空飞行的机舱里,在颠簸不定的火车和汽车上,我也要努力地拿起笔来记下一些想要记下的东西。晚上回到旅舍里再加以补充,务使不致有太多的遗漏。有时写得兴起,还要发点议论,把与此有关的我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杂想,也一并写了出来。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便写了厚厚一本。它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日记,而是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纪实性散文了。

然而,正是由于我对这部日记体作品过于重视,它却一直没能定稿。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地捧出它们,一页页地翻阅,想要再做些推敲,做些润色,却又一次次地被各种杂务所打断,甚至连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都无可能。直到前不久,我才算有了一段完整的时间,把这部日记重新校阅了一次,又请几位好友帮我看了看。他们都说: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日子,却仍可一读。并且建议:应该基本保持原貌,不必作太大的改动。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只是稍加整理,就交付编辑同志。

我当然知道,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万花筒式的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内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彼时彼地的一些实地、实人、实事、实感,如实记下,奉献给读者。至于作品的优劣正误,成败利钝,统统交给大家去评判吧。

顺便说一下,由于这是一部实录性的作品,考虑到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在美国,以后也有可能还要长期在地球的那一边生活下去,为了他(她)们的方便,我不得不对少数人的姓名做了点技术处理。尚希读者和他(她)们本人见谅。

1995年3月—4月于北京

1991年10月30日 星期三 晴转阴
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

飞机正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窗外是一派混沌的、白茫茫的、翻滚着的云海。穿过云海，时而能够看到头上碧蓝碧蓝的天空，看到机翼下面碧蓝碧蓝的海水。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看着看着，不由得便产生了倦意。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81航班波音747宽体客机。上午10时从北京起飞。下午1时到达上海，在机场办了出境手续后，继续飞行。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6时多了，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强烈。太阳仿佛被挂在天上再也不能挪动。时间发生颠倒。行前就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同地球一起追着太阳飞行，从地球的这一边，飞到地球的那一边。也就是说，要在我的生命史上，多出一个1991年10月30日来。即：10月30日近午离开北京，途经上海、旧金山做短暂的停留，在空中飞行18个小时，到了纽约还是当地时间10月30日的傍晚。因此，我早就做好在飞机上睡觉的准备。环顾周围，和我同行的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同志，经过出发前几天的周折劳顿，已经在我身边的座位上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关上舷窗的挡板，伸了伸身子，想要入睡，却忽然倦意全无。眼前的一切，都使我想起1988年去罗马尼亚访问时的情景。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所以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深刻。行前的忙碌、纷乱，几乎和这次一模一样，只是还要更激动些。罗马尼亚的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我。从少年时代时，我就对苏联、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美好的向往。虽然我更希望去苏联访问，但是，能够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罗马尼亚，也算是实现了我的愿望的第一步。我不仅想亲眼去看看那里的风物人情，去结识一些有声望的罗马尼亚作家，还想借那次难得的机会，写一本

罗马尼亚访问记。我带了足够的笔记本儿，准备记下每一桩新鲜的见闻、每一点生动的感受，并且参阅了不少有关罗马尼亚的历史资料。我万万没有想到：到达布加勒斯特之后的第一次午餐，就劈头盖脑地给我浇下了一盆冰水。

应该承认，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对于我们的接待是相当热情的。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一家豪华饭店里为我们每一个代表团成员都安排了宽敞的房间，还特地派了富有经验的汉学家、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杨玲博士做翻译，陪同全程访问。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时间已经很迟了，大家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倒头睡下。次日上午还不到11时，杨玲博士便来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杨玲博士60年代曾在北京读了6年书，回国后翻译过《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是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她在中国有许多朋友。看到我们，像是又回到中国。彼此一见面就说说笑笑，丝毫没有陌生感。侍者端来一盘鲜嫩的牛排，她却忽然变得目光凝滞，迟迟疑疑地一直不动刀叉。我们再三催促，她竟用一张餐巾纸把牛排包起来，慌里慌张地塞进手提包里。她的行动，把我们全惊呆了。我想缓和下气氛，打趣地提出疑问。她才又涨红了面孔解释说：罗马尼亚虽然是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现在要吃到这样好的牛排可不容易。她有个独生子，明天就要参军到边界去。今晚，她想为儿子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失礼举动，希望能得到我们的理解。

沉默。我们一行人，包括上海作家徐俊西，湖南作家谭谈，福建作家蔡海滨，全都默不作声地把自己盘里的牛排用餐巾纸包起来，往她面前推了过去。她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然后又压低了声音说道：“同志们！你们还记得1960年么？！今天的罗马尼亚，就像是中国的1960年啊！”

过了几天，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恩卿同志把我们请进使馆，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罗马尼亚情况，他最后感慨地预言说：“这个政权，如果还能平安地度过两年，就算是个奇迹！”

时至今日，回想起王荩卿大使的那番话，我不能不佩服他作为外交家的远见卓识。但是，在那时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公开报导的。我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因此，从罗马尼亚回国之后，我也就采取了一个特别省事的办法，连片言只字都未发表过。我辛苦带去的那些笔记本儿，怎样带去又怎样带了回来。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出访。我将会在美国遇见些什么呢？我们是去给海伦·F·斯诺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半个多世纪前，海伦·F·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可以不避风险把我国当时的真实情况报告给美国和全世界的读者。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崇敬他们并且和他们从事着同一写作职业的人，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呢？！在飞机上，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睡着了。飞机在旧金山降落。我迷迷糊糊地跟在金坚范同志后面，在美国海关办理了入境手续，又登机往纽约方向飞去。此后，我再也经受不住时差带来的困乏，一直沉睡不醒。

一觉醒来，飞机已抵纽约。机场内外，灯火通明。总领事馆的文化领事王家栋同志等在出口处迎接我们。王家栋领事邀请我们到总领事馆住宿。可是，我们事先已同去年在国内认识的Q先生约好，要住在他所经营的“中国旅馆”里，便乘坐他替我们租来的汽车，往纽约最繁华的街区曼哈顿驶去。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大概谁也不会相信：有着如此堂而皇之名称的“中国旅馆”，竟然那样简陋、那样寒伧？！它的门面，宽不到两米，一块油漆已经剥落的木招牌，很像是国内某个居委会的牌子。汽车已经停在门前，我们还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沿着狭窄、阴暗的楼梯，走上三楼接待室。Q先生、L女士、诗人R、从国内移居美国的汪晓慧女士和她的朋友比尔先生等，都在接待室里等候着我们。这间总共不过十七八平米的接待

室,是全楼最大、最阔绰的房间,它同时还是经理室和服务人员休息室。屋里摆了好几张旧沙发和办公桌椅,活动空间本来就很小了,一下子又进来这么多人,更显得拥挤不堪。一了解,这家可住好几十人的旅馆,那晚竟连一个旅客也没有。惟一的一个服务人员,也临时请假离去。Q先生晚上还要回家住宿。他走了后,这座空空荡荡的楼房,就只剩下我和金坚范两人。大家一合计,觉得我们到纽约后将会有许多客人来访,住在这里,很不方便,还是换个旅馆为好。Q先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他欢迎我们住进来,并且一再表示价格可以优惠,却也不愿相强。经过他和汪晓慧、L女士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便搬进附近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里。

人夜。R先生、L女士、汪晓慧、比尔等先后离去。Q先生热情邀请我们到时代广场旁的一家餐馆里吃夜宵。我凝望着他显得非常疲惫的、苍白瘦削的面容,想起他去年回国探亲和我们在北京相见时的奕奕神采,感到他似乎忽然老了许多。那一次,我们是在邓友梅同志家里见面的。他穿一身剪裁入时的西服,容光焕发,举止适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友梅兄那里,我还得知:他是一个文化人,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在旅美的文化人中,他是一位少见的成功者。赴美三十多年,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好几处房地产,地处闹市的“中国旅馆”,只是其中一处。他对国内的事情都很热心,因而还被推选为我国南方某省的旅美同乡会会长。凡是中国赴美的人员,住进“中国旅馆”,他都给予优惠。所以,旅馆的经营情况也一直还不错。真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旅馆”和他个人的情况,好像都出现了变化。我们很想了解情况,但又不便多问。大家在餐桌旁坐下后,过不久,他自己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去年他从国内返回纽约后,即常感身体不适。他因商务繁忙,迄未抓紧诊治,随后愈觉不支,他就想把“中国旅馆”转让出去。正好有一家日本公司,要在曼哈顿区48街一带建筑商业大

厦,他们很快就谈妥了高价出售“中国旅馆”的协议。不料那家日本公司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拖再拖,不愿再履行尚未正式签字的协议。正在这时,Q先生的喉下发现了个硬块,虽然尚未确诊,却给他的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考虑到他的一子一女,年岁都还太小,万一自己有什么意外,异国他乡,乏人照顾,他所经营的产业很难保存下去。因而,他就越来越想把“中国旅馆”尽快处理掉。即使是低价出售,也在所不惜。这样,他对旅馆的日常业务,当然也就日益松弛下来。美国是个竞争性很强的社会,全力以赴,仍难取胜,稍有懈怠,即江河日下。我们到达纽约的前几天,他已同医院约定:要在下月9日对他的喉部硬块进行手术治疗。病情是好是歹,到那时才能见分晓。此刻,他正处于紧张的等待之中。他感到很悲观,又感到很欣慰。“有朋自远方来”,他当然很高兴,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直到我们离开美国,他仍处在等待结局的忧虑中。他以焦切的心情委托我们:能否在国内迅速找到个单位以最低价格把这幢楼房买去,以便插足美国,在纽约设立个办事处或进行其他开发性事业。他还提议,如能办成,将给中华文学基金会或我们个人10万美元的佣金。我们听了后,只得苦笑笑了笑,表示无能为力。

夜深了。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出餐馆,漫步在纽约街头。闻名世界的时代广场,仍然灯火辉煌。一幢幢巍峨的高楼直指灰蒙蒙的夜空。Q先生边走边告诉我们:某幢楼房,已于某年某月卖给某国公司,某幢楼房正在议价出售,尚未成交。看起来,他对纽约房地产的行情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在指点着这些楼房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浮现出一种行家里手谈到本行业时的自豪感,也流露出难以尽说的悲凉。

在时代广场,我们还看到一些身份各异的流浪汉。有一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吆喝着、呼啸着、打打闹闹地结伴而过。也有些人,身着各种奇装异服在街头行乞。其中的一位,竟把自己扮成机器

人,只要有人往他那金属制成的衣袋里塞进一枚硬币,他就会以机器人的步伐伴着音乐表演一段迪斯科。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在美国连当乞丐也用上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还有几位中国画家,正在街头招揽行为他们画素描。我怕被他们发现,连忙加快了脚步,Q先生却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衣襟,低声告诉我:仅仅在两个多月之前,有一位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青年画家林林,就在这里被美国黑人歹徒无辜枪杀。他的血迹未干,又有一些来自我们那个古老的文化之都的青年艺术家,为了在美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深夜来到这个充满危险的街区。

一阵阵从大西洋岸边吹来的深秋之夜的凉风,吹拂到我的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这一夜,我本来应该好好补上白天的时差提前入睡的。但我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没有睡好……

10月31日 星期四 晴转阵雨

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在曼哈顿区42街末端,面对宽阔的哈得逊河,是一座18层的大厦,看来很是威严。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总领事馆商谈颁奖事宜。在总领事馆内,受到王家栋文化领事和副领事孙澜涛、张勇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国外呆久了,很想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大家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一起商谈了访问日程,还互相介绍了目前美国及我国的国内情况,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孙澜涛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学校时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和我的婶母顾传铮、堂妹京平、堂弟和平都很熟悉。他谈起了我的叔父张星五之死,不禁使我心胸中顿起波澜,默然良久。对这段尘封了许多年的往事,我似乎早已忘却,或者说早就麻木了,一旦经人挑破,那伤口原来还是新鲜的,仍然有摧心摘胆之痛!

我和星五叔只相差三四岁，不仅是中学同学，还伙着一个行李卷儿在解放战争末期参加了革命，日则同行，夜则同被，说是远房叔侄，其实情逾一母所生的嫡亲骨肉。50年代我被错划成右派，他则由安徽调进北京，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其间，我曾两次来京，相见时仍然毫无间隙，他对我的坎坷命运不仅慰勉有加，每次分手时，还都尽其所能的让我多带回些衣物和食品，帮助我渡过难关。不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竟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暴徒们一面用棍棒、皮带抽打着他，一面疯狂地弹起钢琴，想用琴声淹没他痛苦的嚎叫声。其残忍凶狠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80年代初，我也调到北京工作，每次路过外语学院所在的魏公村附近，即神思恍惚，觉其仍在左右，音容笑貌，宛若当年。归来后常于梦中与之相会，睹其遍体鳞伤之惨状，醒来即泪流不止。这段血泪史，我从未在文字中表述过，也极少同人提及。如今事隔二十余年，竟又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听一位我从未想到过的年轻朋友追忆此事，怎能不感慨系之！

中午在一家日本人办的自助餐馆里吃了顿价廉物美的午饭。这家餐馆的生意很好，来就餐的不仅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等等，还有许多地道的西方的中、下层人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几乎每一张餐桌都座无虚席。在纽约，随处都能看到日本经济势力的严重渗入。大到一家家素享盛名的公司转移到日本人的名下，小到这种生意兴隆的餐馆、酒吧和娱乐场所，简直无所不在。难怪有人说，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能用飞机大炮达到打败美国的目的，现在却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了原有的目标。

顺便还去中国银行驻纽约办事处看望了正在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原联合国高级专员潘先生的夫人于湘女士。她是办事处的会计部主任。我们有一些外汇转换手续，必须请她协助办理。

当我们回到旅馆时，原在作协外联部工作的张泉涓和她的丈

夫王虹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张泉涓是去年10月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美国和丈夫团聚的。王虹在一所大学里攻读建筑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正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尤其萧条，许多美国人都失了业，中国留学生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更难了。他们到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台湾来的工程师那里找到个临时帮忙的位置。张泉涓则在一家餐馆里打工。他们一家三口，依靠夫妻俩很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在纽约生活得很艰难。小张从前在作协工作时，我们每天都打个照面，但却很少说话，偶或有事找到她，总是微微一笑，轻言慢语地应上几句话就走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娇小、内向的女子。这次我们一见面，她就滔滔不绝诉说苦衷，嚷着要和我们一道回去。她说：“我们的日子过得苦极了！收入少些，生活苦些，我还不怕。我最怕看到餐馆老板那双冷冰冰的、充满挑剔的眼睛。无论你走到哪里，那双眼睛似乎总在盯着你，恨不得你每一秒钟都像机器一样地转个不停。”她还说：依她自己的意思，到美国不久就要回去。可是，筹措一笔来美国的旅费很不容易。王虹觉得：既然来了，总该混出点模样来，才好回去见家人好友。所以，他们就这样犹豫再犹豫，彷徨复彷徨，一直拖了下去。

听着张泉涓的诉说，我和金坚范俩人都不知回答什么是好。我们刚到美国，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了解甚少。张泉涓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调到中国作协后，工作勤勤恳恳，和周围同志的关系都不错。她在国内已经习惯于受到人们的尊重，现在换了另一种环境，产生这些心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金坚范同志是她的顶头上司，来美国前受王虹父母的委托，给他捎来了件漂亮的皮夹克。张泉涓只是在看到那件皮夹克时，脸上才出现笑容。

今晚是鬼节。鬼节是欧美很盛行的一个大节。相传上帝将在11月1日这一天，隆重接受众多圣贤的拜谒，所以人们便在这天

的前夜,装扮成各种鬼神集会庆祝。纽约的传统是在曼哈顿区的14街附近,举行声势浩大的化妆游行。届时几乎是倾城出动,热闹异常。下午5时许,张泉涓和王虹还没走,R先生和L女士就赶来了,他们都表示:既然碰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得去见识见识。R先生和L女士还邀请我们和张泉涓夫妇一同出去吃晚餐。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跟了去。

天近黄昏,我们在一家快餐馆匆匆吃了点东西,就乘地铁前往14街口。纽约的地铁我闻名已久,它的规模很大。在纽约地下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仅时代广场地铁站一处,就有十多条路线通过,但管理得并不算好。出入口处的巷道里废纸遍地,小便臊不可闻。或许是因为鬼节的缘故,更显得人流拥塞,秩序混乱。和香港的地铁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较之北京地铁,单就秩序和卫生而言,也无优势可谈。美国建国只200多年,本世纪初纽约便有了地铁,算起来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也许可以这样说:纽约的地铁是一个年轻国家的古老的地铁,而北京的地铁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年轻的地铁。古老和年轻,从来都是相对的。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来美国之前,我看了一篇叙述纽约地铁的历史功绩及其存在问题的文章。到这里来印证一下,觉得那篇文章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晚7时半,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我们总算来到了14街口。化妆游行已经开始。街道两旁站满了人,里里外外好多层,水泄不通。我们来晚了,只好站在后面伸长了颈子往里面观看。这种游行,和我们国内一些传统节日的集会游行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参加游行的人大多戴上假面具化妆成各种鬼神,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游行队伍里,也时而夹杂着些具有现实内容的化妆表演,很受欢迎。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庞大的游行队伍中,几乎看到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世界的各色人种。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性很大的移民国家。据报刊资料:仅1980年到1990年来

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就达 1000 万人,其中华裔的移民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些人已经和美国本土的居民逐步融合,更多的人还像浮萍一样没有生根,有着浓烈的漂泊感,还有一些人的命运甚至是相当悲惨的。但是,从世界许多地方发了疯般地想要奔到美国来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在国内,我也接触到为数不少的年轻人,他们对人生旅程的最终设计,似乎就是要到美国来过上一阵子。美国对于所有这些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他们来了之后,究竟生活得怎样?这是我来美国之前和到美国之后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必须抓紧时间多看、多听、多问,尽可能地了解出个子丑寅卯来。

怀着这种目的,看了鬼节的游行之后,虽然已近深夜,我仍然要求 R 先生和 L 女士带我们去逛逛纽约的中国城。这时,天上已经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乘出租汽车穿过中国城的街道,冒雨来到一座四五十层高的红砖大厦的旁边。R 先生告诉我:这座大厦就是在旅美华人中很有些名气的孔子大厦。“文化大革命”中,国内一度掀起了批孔的高潮,一些亲台湾的华人就筹资兴建了这座大厦,还在这座大厦的前面立起了孔子的塑像,公开宣称:“他们不是要批孔么,那我们就更要尊孔、崇孔,不能让至圣先师的学说,在他们手里断了线。”一时曾在海外华人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文革后,国内大大加强了对孔子的研究。去年夏天,我去山东曲阜,看到有关孔子的一切建筑都已修整一新。山东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多达一百多卷的《孔子全集》。这些消息,陆续传到美国,才逐步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可见,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必须持何等严肃谨慎的态度。否则,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千千万万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的心!

纽约的中国城,又被称作城中之城。它位居曼哈顿区的东南部,十几条街道竟然聚居着 10 余万华人,加上每天从散居在纽约各处赶到这里来打工、做生意的华人,共有二三十万人之多。我们